

乡村记忆

街面忆往

爱情传说

潘云强

1961年至1964年,我在烟台一中读初中。

一中的正门在二马路,北向。西边的福山路还有一个单扇木门,为抄近路,我常走这个门。在福山路上,我常碰到一个年届花甲的苏俄(当时对前苏联的称谓)老太,她身材高大,鼻梁挺直,皮肤白皙,深陷的眼窝下的那双蓝眼睛透出一丝丝忧郁。

老太太是个讲究人,十分注重仪表,外出时,不但衣服干净,而且还要化一下淡妆。冬天,中国老年妇女头上普遍戴的是镶嵌着绿石英的黑绒帽,而她则围一个深色图案的大穗头围巾。她是我人生中见到的第一个外国人。

因她是个外国人,有着一张与众不同的洋面孔,我便对这个苏俄老太格外关注,甚至对她的命运有着某种杞人忧天的担心。她在中国过得好吗?幸福吗?她是如何来到中国的?又怎么到的烟台?只要见到她,这一系列的问题,便会不由自主地在我心中升起。后来听人们说,这个苏俄老太年轻时便来到了烟台,她的美丽很快成了小城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年少的我更想知道的是她那么早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不想父母与家乡吗?

福山路是条南北向的小路,顺山势呈北低南高走势,路两边有一些树木,夏天傍晚时,常有老人坐在树下乘凉,一些男人拿着茶壶,一边看着路上的光景,一边喝着茶水。忙过家务的妇女们则摇着蒲扇,三五围坐在一起,悠闲地拉着家常,孩子围在她们身边嬉笑打闹。我的目光时常有意识地在她们中间游移,却从未发现那个苏俄老太的身影。

一个春天的早晨,轻风拂柳,小鸟欢唱,我的心情也很愉快。当我脚步轻松地走到福山路,远远地看见从市场归来的苏俄老太,手里提着一些菜走在前面。突然间,她被绊了个趔趄,如同电影慢镜头,一点一点倒下去。由于摔得不重,等我赶到跟前,她已站了起来,正弯腰拍打着弄脏了的衣服。我顺手把掉到地上的菜捡起来递给她,她说了句:“孩子,谢谢你!”呀,她会说中文啊!苏俄老太道完谢,提着菜,继续向坡上走去,春光里那个高大且孤独的背影成为我永久的记忆。

上中学时,我学的是俄语,“玛达姆”是俄罗斯对已婚女人的称谓。有时,同学们也会称那个苏俄老太为“玛达姆”。那时,人们都推崇苏俄的文艺作品,二战时期的歌曲及高尔基、托尔斯泰等作家深得人们的喜爱。我也喜欢看俄罗斯诗人的作品,像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以及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大概过了一个半学期,我才偶然得知苏俄老太是因为爱情来到中国的,她邂逅了一位烟台小伙,并爱上了他,便义无反顾来到中国。可是直到毕业,我一直也没见到她的爱人。他是谁?长得什么样?他们之间又有怎样缠绵悱恻的故事……我又不得而知。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只叹自古至今,多少风花雪月,金玉良缘,到头来淹没于滚滚红尘。

老家的胡同

衣成龙

老家的胡同,南北长66米,南头是村前的小河,北头是红色革命旧址——衣氏祠。衣氏祠是胶东国共合作谈判的地点和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后方医院所在地,一座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的古建筑,山东省文物保护单位。

胡同很直,从南到北没有一点弯曲,东西很宽敞。我家门口道西,有两个只有一墙之隔的菜园。两个菜园中间有一条小道,延伸到一口水井旁边,这口井供应着村西头半个幢的吃水。

胡同里一共住着9户衣姓人家。我的辈分最小,整个胡同里的大人,我要称呼爷爷、奶奶、老太太……我家街门对着一户人家,我叫她老太太。老爷爷很早就去世了,老太太只有一个女儿,18岁就嫁人了。老太太的辈分和年龄,在整个胡同里是最大的。我记事的时候,老太太已满头白发,由于终年劳累,生活的重担压弯了她的腰。

她有一个外孙女,比我大10岁左右,从小在老太太家里长大,和她相依为命。我和姐姐叫她小姑。由于家里穷,小姑一天学没上,一个字不识,小小年纪就帮助姥姥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能吃苦,什么苦活累活都能干。我三姐云花、四姐云香、五姐云敏,只要上山挖野菜、拔猪菜,每次都从后窗叫她,她是姐妹们上山最好的伙伴。

她家里只有三间低矮的茅屋,一个草棚,一个破烂不堪的南屋,房子大概上百年了,很老很陈旧,东间被草棚遮得黑乎乎的,老太太和小姑住在西间,西间没有挡墙,比较亮堂。我家里兄弟姐妹多,云花姐经常去老太太家里睡觉,小姑就和云花姐睡东炕。

有一天晚上,她俩正准备睡觉,一条长虫突然从屋梁上掉下来了,可把云花姐和小姑吓坏了。那长虫吐着可怕的信子,沿着炕角爬,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急中生智,赶快找了个脸盆,把那条长虫扣住。第二天早上回家,云花姐告诉我们这惊险的一幕,我们听了都头皮发麻。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人,在我的记忆里,每当家里做了比较好的饭,比方擀了缸豆汤、芋头汤之类的饭,母亲就盛上一大碗,对我说:“给你老太太送去吧!”我就端着饭碗,送到她家里。

老太太穿的衣服很破旧,小姑也穿着有很多补丁的衣服。那个年代,农村是很贫穷的。

抗日战争时期,老家的胡同的9户人家中,有11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是胡同里最早的共产党员,也是村子里最早的共产党员。他在学校读书期间,就加入了党组织,以教学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

胡同里有4名女党员,都是在十五六岁秘密地加入了党组织。在全村7条胡同中,老家的胡同是党员最多的一条胡同,不仅党员多,而且参加八路军的人数也是最多的,有7人参加了八路军。

4名女党员中,衣兰香、衣山花、

衣桂兰3人,1939年时十五六岁,她们跟随着后方医院(当年八路军后方医院在回龙芥村)参加了八路军。我大姐衣云英,那年12岁,是儿童团团长。1942年,15岁的她在父亲的带领下,和几名党员一起在大山里举行了入党宣誓。入党后,她担任村里的妇救会主任,带领全村妇女为抗日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我家门口对面的衣振蔡大爷,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1939年秋天,在给八路军往福山送信的途中,在岔芥口子被日寇枪杀,壮烈牺牲。他的女儿衣山花,15岁入党,就在她父亲牺牲的当年,参加了八路军。她的母亲,我叫奶奶,小时候,对这位奶奶的印象特别深,因为是一个门口的,天天都能看见她。她个子很矮,一双尖尖的小脚,穿着朴素,干净利落,花白的头发后面,挽了一个髻,上面套了一个黑色的头网,一根银白色的簪子,插在头网里。她经常爱唱一首歌:“小白菜啊,渐渐黄啊,三岁两岁,没有娘啊!”她的歌声很悲切,也很动情。大爷牺牲以后,她毅然决然地把15岁的女儿送上了战场,自己一个人拉扯着一个小女儿和两个七八岁的儿子艰难地度日。对这位英雄的奶奶,小时候,我非常尊敬她。

胡同南头,还有一位老人,我叫他大爷。在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他把自己的女儿衣桂兰(16岁)送上了战场。解放战争中,他又把儿子送上了战场。还有我家房前的大爷和二爷兄弟两人,也先后都参加了八路军。

新中国成立后,老家的胡同又增加了几名党员,我大哥衣德龙在大学入了党,我们兄弟三人都是中共党员,我们家里有5名党员。

在少年时代的记忆里,我对老家的胡同有着难忘的情愫。炎热的夏天,吃过晚饭,胡同里的人先后从家里出来,聚集在我家门口,有的拿着芭蕉扇,有的拿着用麦管自制的扇子,一边驱赶蚊虫,一边开始聊起天来。胡同里的人,性格各异,有的很健谈,有的比较沉默,大家聊的话题很多很广泛。胡同里的人,每晚都聚在一起,增加了街坊邻居之间的感情,一个胡同的人就像一家人一样的亲密。

我大哥大学毕业以后,参加了工作,他买了一些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等电器件,自己组装了一个收音机捎回家。那个年代,收音机就像个宝贝一样,农村人很少看到过。吃了晚饭,母亲就把收音机拿到门口,叫胡同的人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的新闻,有时候还听京剧、吕剧。东、西胡同的人也有过来听收音机的,大家说说笑笑,很是热闹。

老家的胡同,是我永远抹不去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了,少年时代胡同里的长辈们,都已驾鹤西去了。现在每次回到老家,走到家门口,长辈们的音容笑貌,仍然非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好像他们并没有离去,仍然聚集在一起天南海北地说笑着。

黑白电视往事

刘宗俊

童年时,农村文化生活贫乏,漫长的夏夜尤为难捱,农家人除了拖着板凳摇着蒲扇三人一伙、五人一簇地在屋外谈天说地,就没有别的消夏方式可选了。

我家在村里较早买上了二极管收音机,每天晚上6点半都会聚到收音机前,支起耳朵听刘兰芳的长篇评书《岳飞传》《杨家将》。那时,村里收音机也不多见,算得上稀缺物,对于家里无收音机的评书迷们来说,“蹭听”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远在东街的三爷就是一个铁杆的评书迷,饭后雷打不动地到我家听评书,正屋靠东面的一把椅子就是他的专座。

小孩子是坐不住的,让大人吓唬着听那么一小会儿就不安分了,找个借口与小伙伴们到外面疯跑去了。

农村放电影,对一个小村子来说,一年也就那么一两次,放的都是《地雷战》《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等红色经典老片。即便如此,也足足地吊着我们这群孩子追着放映员从这个幢跑到那个村。

那时就想,啥时能不用占座,在家里炕上坐着想看什么就看什么就好了。1979年夏末秋初,我小叔成为第一个把电视机抱回家的人,在村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人们充满了羡慕。小叔是村里不多的几个“出外”的人,在牟平铁矿上班,拿着旱涝保收的工资。

那时电视机黑白的居多,公社驻地的供销社不卖电视机,只有离村18里的县城百货大楼里有卖的,日本“三洋”牌的一统天下,型号是12英寸,块头不大,价钱不低,几百块钱,对于土里刨食的农家人来说,不啻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天傍晚,刚从山上薅猪菜回来,我就听说小叔家买了电视机。草草地扒拉了几口饭,我就与小伙伴们一溜小跑到了小叔家的院子里,可是院子里已聚满了人,我们只好爬到院墙上坐着。小叔家的屋子小,知道来看电视的人多,就把电视搬到院子中间的桌子上,并把家里的几个凳子也搬了出来,方便老人在前面坐着看。

电视播放效果可不怎么好,别看是日本品牌,巴掌大的屏幕上全是雪花点,吱吱啦啦的杂音,但人们仍然伸着脖子看得津津有味。我印象最深的是,因去看的人多,有一次小叔家的猪圈险些被挤塌。

隔了不长时间,我家也买回了同品牌的黑白电视机,隔壁的二叔很快也将电视机搬回了家。这样,我父亲兄弟三人就成为我们村买电视机的前“三甲”。

那时的电视机收不了几个台,接收信号靠竖在院子里的天线,通过调整天线的方向来接收。看电视也要看老天爷的脸色,晴天效果好,刮风和雨雪天电视屏幕一片雪花。仅靠室外天线还不行,还要不停地调整室内天线的角度。遇到风雪天,想从头至尾完整地看一个电视节目可真的不容易。

时过境迁,如今的电视机不仅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家用电器,而且屏幕越来越大,品牌、型号众多,卫星直播100多个频道可以随心所欲地看。曾经辉煌一时的黑白电视早已销声匿迹,成为一个念想封存在一代人的记忆里。